

由受难者到闯入者——

新世纪海外华人作家的 历史记忆与跨文化想象

□师力斌



①陈谦
②陈河
③张惠雯
④袁劲梅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美国华尔街游行持续了两周的时候，疲软、低迷的西方世界进入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谷，与看上去坚挺、蓬勃的中国刚好形成反差。这一现象正成为人们，包括海外华人无法忽略的历史大势，这一大趋势所引发的日常思考和个体感受在严歌苓《吴川是个好女孩》、袁劲梅《罗坎村》、哈金《牛仔炸鸡进城来》、陈谦《残雪》、陈河《女孩和三文鱼》、陈九《挫指柔》等多部小说中已有微妙的表达。

两大主题，两个形象

中国大陆的历史记忆与海外的移民生活，是近十年来海外华人小说的两大主题。受难者和闯入者是两个重要的形象。

赵毅衡所谓的“无根的写作”，可能揭示出这些华人作家的身份焦虑与文化困惑。他们更多的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认同，而是遭遇海外生活刺激之后的跨文化想象。既在又不在的“中国”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情结。他们的历史记忆有着海外文化的观照，具有全球化视野；海外移民生活又渗透着浓重的中华文化记忆，他们需要不断追问自我的

来路。近年来颇为活跃的女作家陈谦的一番话颇能代表这种心理。她说：“成年以后，我一离开广西就到了美国。我经常跟人家讲，是美国教会了我珍惜我的来历，珍惜我父母的出处，这是真心话。美国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个人身份标识的地方。你的经历越独特，你的自我ID，就是所谓身份的标识就越清楚……我从哪里来，我在哪里长大，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可以说，海外华人作家关于中国的历史记忆是文化碰撞的结果。

张翎的《余震》是这种跨文化想象的典型文本。小说借唐山大地震和两代人的故事，来思考灾难带来的人性伤害。不但包含着天灾所造成的心灵伤害，更包括对母亲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的反思，以及对养父狠心弃女的人性恶的刻骨记忆。这种心理创伤即便是发达的西方文化也难以治愈，最终只能归故乡的老屋。这一处理表达了海外华人非常复杂的文化心态，即既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清晰和深刻的反思，但又不能完全脱离中国文化的牵绊。跨文化经验的呈现，扩大了汉语小说写作的疆界，我们很难再用中国人/外国人这样的框架来定位作品的人物和心理。

严歌苓是近年来成就斐然的华人作家。她的作品有两个类型，一类是关于中国记忆的，讲述红色年代的个人遭遇，特别是女性的遭遇，突现了一个受难者的

中国闯入者形象表现最为典型的文

本是袁劲梅的《罗坎村》。《罗坎村》是一部以政治入文学的典型小说，它大胆直白地引入政治议论的写法，特别是在副标题中直接引用罗尔斯的语录。小说更为深层的文化焦虑是它标明了一种海外华人对于新新中国难以理解的文化态度，即对过去的历史有清晰的判断，而对正在发生的现状却举棋不定。这种现象恐怕不仅存在于海外华人作家身上，而且存在于整个世界。中西方的文化记忆绝非像80年代那样黑白分明，高下立判，而是处于一个胶着的状态。如果按照许多国内批评家的解读，《罗坎村》将中国两千年来超稳定结构或者是民族文化劣根性的劣根性，做了一次新的呈现。然而，这个文本还包含了另外的意义，那就是对新的中国状态的困惑和犹疑。《罗坎村》中代表文化痼疾的中国男孩，在美国校园中强吻女孩，公开行贿美国法官，在美国横冲直撞，简直就是对西方文化的冒犯，他粗鲁、野蛮、目中无人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中国东亚病夫的形象，也改变了80年代以来留学生文学中在美国拼命打拼生存艰难的“边缘人”形象，而成为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强悍的闯入者，与风风火火在全球游走的中国形象惊人地相似。由受难者到闯入者，恰恰是中国一百年历史沧桑变迁的结果。

同样的闯入者形象是旅美作家陈九的传奇故事《挫指柔》中的中国家长纪季风。这既是一个中国功夫的传奇，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绝妙文本。它在两个方面有着令人震惊的文化想象：一方面是美国弱肉强食的校园文化和校园暴力，特别是美国政治与天主教之间的复杂关系，展示了美国历史和文化恐怖阴冷的一面。同时，中国家长纪季风不露声色、制人于无形的高超功夫和深不可测的心机令人胆寒。作品透露出双重的焦虑，既颠覆了80年代以来我们对美国的美丽想象，也流露出对中国的恐惧。纪季风的心机无疑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美国人显然

不是他的对手。这个冷酷的闯入者形象也是以前的文本中没有的。

还不仅如此，更令人惊异的是杀气腾腾的闯入者。陈谦的《残雪》和陈河的《女孩和三文鱼》提供了这方面的独特想象。《残雪》讲述一个中国弃妇到美国寻找留学归来的丈夫，路遇另一个中国姑娘，后来才知道，这个姑娘的房东就是她的丈夫。整个故事充满了可怕气氛，尽管最终没有杀人，但这位中国姑娘“我”却逃离了担惊受怕的中国房东和他的女人。可以看出，中国姑娘“我”的主体既是中国的，又是美国的，恰好是一个跨文化的混杂主体形象。陈河的《女孩和三文鱼》几乎是看到的近十年来海外华人小说中惟一一个杀人的中国闯入者形象。这位名叫周沸冰的中国男孩喜欢上了另一个中国姑娘，由于姑娘的中国房东禁止陌生人留宿，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便诱骗房东的女儿外出并杀害了她，以为报复。整个故事有侦探小说的框架，显示了作者丰富的阅历和广博的知识面，也流露出与女性作家不同的阳刚，体现出一种“气象万千”的气质。

可见，历史记忆和海外生活成为海外华人作品的两大主题，受难者和闯入者是两个重要形象。一方面，在历史记忆的深处，存放着一个无法磨灭的中国形象，他身上有着历史留下的千疮百孔，然而，在感情上又维系着与这些华人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血缘关系，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联系。

差异性与个体化

千万不要认为海外华人是一个联系紧密、共性突出的群体，也不要将他们看作一个整体，这种宏大叙事恐怕是绝大的错误。正如饶芃子先生曾经指出的，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更重要的课题是讨论他们千差万别的个体性。从小说形象来探讨他们的写作只能说是一种权宜之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或许是由于距离感，海外华人的写作体现出与国内作家完全不同的风格与题材。放眼全球，五花八门的题材和写作风格向我们展现了海外华人多元化的写作生态。张惠雯的作品《水晶孩童》表明了一种纯艺术的冲动和努力。该作带有童话色彩，主要靠想象力完成。而张惠雯小说创作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纯艺术性。发表在《青年文学》的《爱情的五个瞬间》以不同的场景连缀在一起，传达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心理，带有鲜明的实验色彩。而马来西亚作家朵拉的《空箱故事》和美国华人作家王鼎钧的《单身温度》都保持了让人惊讶的纯文学写作方式，他们近似于抒情的文字和诗意的笔法，与当下大陆的流行风尚拉开了距离。另外，讲述大都市现代人生活的情感故事，也是许多作家关注的主题。美国华人作家木马的《古狗》是一篇令人难以割舍的好小说，仅以几千字的篇幅就写出了当下人生活的内核，小说把互联网时代机器对人的挤压表现得淋漓尽致，敏锐而深刻地点出了人类的通病。

所谓跨文化，就不单单是两种文化的重叠或者累加，而是交融、碰撞。虹影的《鹤止步》是一篇非常独特的小说。表面上，它与我们当下流行的谍战电视剧几乎没有差别，然而，这个故事的内核却有着浓厚的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双重思考。它有些像《断臂山》与《潜伏》的混合物。它的思想核心在男人之间的情感，而壳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框架。

定居匈牙利20年的余泽民的《空城》，讲述的是在女性主义思潮中诞生的男性反思。被动做爱的男性在与妻子的交媾中喊出了自己的不满。男权的维护恰恰是在海外文化的语境中提出来的。它力图打破女性受压迫的普适神话，而将男性受压抑的问题提出来。这是一部以女性主义策略来反思女性主义的独特文本。它提醒人们，生活的实践需要的是具体而微，而不是盲目追慕那些总体性的话语。总体上看，欧洲华人作家的写作与北美似乎有一种较为明显的差异。欧洲的中国情结没有那么浓重，他们的书写更多倾向于现代生活和观念，而北美新移民作家对历史情有独钟。法国华文作家蓬草的《来喝一杯茶》，郑宝娟的《收银员之死》，都是对大都市人与人情感冷漠的质疑与反思。包括东南亚的黎紫书《疾》，马来西亚朵拉的《空箱故事》，都着眼于现代人的情感世界。

刘墉一向以散文风行于世，而他的小说《狗肉》，却以精练的文字和突出的思想写了一个吃人的故事，象征了一种牢固的中国记忆，即那种缺乏人道主义的、人的生命如草芥般的社会状况。尽管这种文化立场多少有些陈旧。

沙石《情徒》： 人性奥秘的探微

□公仲



刚读完严歌苓的《陆犯焉识》，我又看到了沙石的《情徒》。两位来自旧金山的新移民作家竟然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转向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且还写了两代知识分子在中美两地的各种生活遭际和不同的命运。这在中国当下小说大都写社会底层民众或中小资群体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动向，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值得关注。

《陆犯焉识》是写上世纪初期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一生的命运；而《情徒》则是写上世纪后期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情感历史。更有意思的是，两部作品都写了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陆焉识是从两段婚外情中走出来，最终与妻子生死相依。而《情徒》主人公大宝则复杂多了，有青梅竹马的小野，有假结婚真夫妻的黑女佣，还有浪漫痴情的洋歌星。结果，女佣另有所爱，离了；小野已为他人妇，可望而不可及；大宝只有与洋妞走进了“狼屋”，回归大自然。

《陆犯焉识》是在写人物的命运史，走的是一条严谨的传统写实主义道路。而《情徒》主要以情感为线索，探索人性发展的轨迹和人性深层的奥秘，却并不过分地拘泥于社会现实的真实。当然，也还是有一个较完整的故事：大宝是有个名气的作家，他追求创作自由和个性解放。可是经纪人威廉想天开地要他包装成为一个“中国制造的美国作家”。让他出国假结婚拿绿卡，又送他到远离都市的山野“狼屋”去闭门造车写小说。然后再回国来大肆宣传推销他的小说：什么“新书发布会、记者会、签书会、研讨会、大小宴会、读者见面会，还有电台、电视台、网上访谈等等，这一切都要跟上去”。大造舆论之下，小说3天就位居全国小说排行榜榜首。再回美国，大宝又被商人老麦当相中，做了一笔卖文生意：给老婆生子筹钱，大宝捉刀代笔，以老麦当的名义，写了一篇小说。最后，在一场文学研讨会上，威廉与老麦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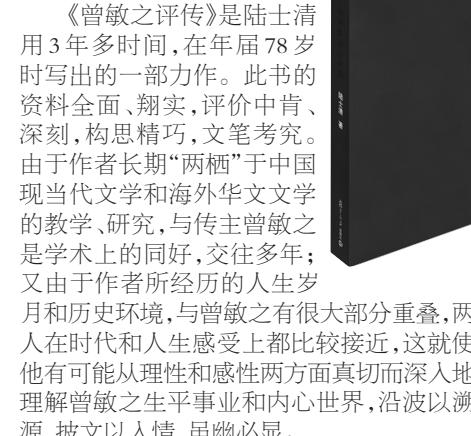
密谋策划，让老麦当一举成为了名作家，而大宝反被诬为“嫉贤妒能的恶人”。大宝愤世嫉俗，最后与情感受到伤害的索菲亚一同回到远离尘嚣的“狼屋”去了。

这故事看来是不太真实的，甚至像个荒诞剧，这也许正是作者追求的一种批判意识，一种反讽、讥笑和冷幽默。一个作家贴上美国的标签就能忽悠中国百姓，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也许还有可能，90年代以后老百姓就根本不会买账了。经纪人要是做这种投资，必定是血本无归。倒是捉刀代笔、骗取荣誉的事，在海内外文坛屡见不鲜。尽管故事荒诞不经，可里面所显现出来的人情百态、人性丑陋，如作家的痴情木讷、经纪人的奸诈诡谲、老商人的贪婪和欺名盗世，却是真实可信的。这未尝不是一种写法和创作套路，荒唐的社会现实，也许正需要荒唐的表现形式呢。真实的扭曲放大，把人灵魂深处最隐秘肮脏的东西和盘托出，振聋发聩，引以为鉴。同样，人性中那些美好和善良，也可在变形异化的现实生活中得以表露凸显，光彩照人，诲人从善。

小说探索人性发展的轨迹是有两条平行线：作为一位有所追求的作家查理斯（大宝），被经纪人威廉牵着鼻子走，在中国美国来回悠悠，忽悠，结果又被欺骗、出卖，落得个一事无成。而作为本是无欲无求的“情徒”大宝，却演绎了不少故事。在国内，与小野从小打情骂俏，可有情无缘，有爱无果；到美国，与冈布娜无情无缘，无爱有果，终至分手；惟有索菲亚，她先与威廉有爱无性，甚至又搞同性恋，最终，与大宝爱结合，远走高飞，但能否长久，只有天知道了。小说主人公王大宝（查理斯）有心当作家，却被人戏耍了；无心做情徒，却又成了一个地道的十足的情种。生活就是这样地捉弄人，也是如此地给人以警示。

尽管《情徒》是以心理分析为主线，可谋篇布局、情节结构的编排还是十分紧密、灵动的。作者沙石善于在情节自然流畅的发展中，突然峰回路转，别开蹊径，让人耳目一新，拍手称快。就如大宝回国开签书会，他正志得意满地坐在众多读者面前签名时，突然发现了小野的儿子。他立即撇下所有读者和签书会的人不顾，独自一人跟随那小孩到小野家里去了。这突如其来变故，既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可见大宝的个性是只求对小野的真情，并不在乎什么名利地位。再如那场文学研讨会，作为主讲人、执笔者的大宝一下子竟变成了恶人，而那“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冒名顶替者却成了座上宾、大作家。这情节的突变，既可见大宝的木呆，也更显出威廉、老麦当的狡诈阴险。还有在禁闭的狼屋中寂寥无聊的大宝突遇索菲亚的来访，看上去十分唐突意外，却也正符合索菲亚性格行为的逻辑，在那荒无人烟的地方，干柴遇上烈火，从此她和大宝就有说不清的干系了。直到最后，他俩走到了一起，也该是合情合理的了。

沙石的怪诞、冷幽默在《情徒》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诸如，假结婚成真丈夫，中国制造美国作家，母老鼠咬死公猫，兽医治人病，性无能成花花公子，真商人成假作家……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我曾说过，沙石“走的是一条人性探微的心理分析之路，当然也不乏有小说故事情节的离奇生动，人物性格的独特怪异，思想感情的丰富深沉，语言的冷峻幽默”。



《曾敏之评传》是陆士清用3年多时间，在年届78岁时写出的一部力作。此书的资料全面、翔实，评价中肯、深刻，构思精巧，文笔考究。由于作者长期“两栖”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教学、研究，与传主曾敏之是学术上的同好、交往多年；又由于作者所经历的人生岁月和历史环境，与曾敏之有很大部分重叠，两人在时代和人生感受上都比较接近，这就使他有可能从理性和感性两方面真切而深入地理解曾敏之生平事业和内心世界，沿波以溯源，披文以入情，虽幽必显。

我以前虽然也曾读过曾敏之的一些作品，但涉猎甚浅，这次细读该传记，才有了全面了解。上世纪30年代，曾敏之在青少年时代即以孤苦寒微之身，顽强奋斗，自学成才，在追求人生价值过程中明确而坚定地建立起“以文章报国”的崇高志向，风雨兼程，奉献至今。70余年间，他遍历文学、新闻、教育等诸多领域，集作家、报人、教授、诗人、文学活动家于一身，先后出版小说集、散文随笔集、诗集30余部，著作等身。他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早以现实主义笔触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家之一；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于前线和后方，写了大量激励人心的通讯报道的《大公报》记者；他博学广识，才思敏捷，文史兼治，其散文、随笔和旧体诗词的写作蜚声海内外文坛。1978年秋，他奉调香港，出任《文汇报》副总编、代总编，从文化方面为香港回归和回归后的繁荣发展，尽心尽力，打开局面。作为香港左翼文坛的领军人物，他立足现实，环视古今，不仅写了大量讴歌改革开放、弘扬民族大义的社论、评论和诗文，而且广交朋友，振兴文事，倡建作家联会，把香港文学推向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是他率先以开放包容的气度，呼吁内地学界关注、研究香港、澳门、台湾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现状和历史，并身体力行，写了许多文章，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如今，“世界华文文学”已经成为一门蓬勃发展着的显学。因为

“文章报国”有知音 ——读陆士清《曾敏之评传》

□蒋守谦

曾敏之是这个学科的拓荒者，2002年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时，这位已年逾八旬的老人仍被推举为名誉会长。

曾敏之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上世纪40年代他曾因报道中国国民党的反独裁、反内战斗争而坐过国民党的牢；50年代他因在“鸣放”中直言进谏而被以“内定有派”的罪名下放劳动；“文革”中更是劫难逃地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尽屈辱。然而这一切丝毫没有动摇曾先生“文章报国”的意志，相反，却把他磨砺得更为坚强成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对朋友们说，他的悟性和做出的成绩，“都是从历代仁人志士爱国忧民传统中受到教育和启发得来的”。为这样一位历经时代风雨而又劳绩卓著的爱国知识分子立传，作者可谓是自觉而勇敢地担起了一份责任。

评传之所以写得引人入胜，耐人寻味，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作者始终把传主曾敏之90多年波澜起伏的人生历程，放到他所置身

的中国历史的大动荡、大转折、大变化的曲折过程中来认识和叙述，夹叙夹议，亦传亦评，前呼后应，繁简两宜。风云变幻的时代环境，是曾先生人生选择和进退得失的外部原因；“文章报国”的坚定意志，则是他不屈不挠、奋斗不息的内在动力。哪怕是交友、婚恋、游历，乃至兴趣爱好，也都或深或浅、或浓或淡地带着他所挚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和时代生活所赋予他的特定情愫，读来意味深长。比如《周恩来访问记》，这是曾敏之作为《大公报》记者在1946年写的一篇产生过重大而又深远影响的长篇通讯，也是中国现代新闻史、政治史和文学史上第一篇由中国人撰写的向全国和全世界全面介绍周恩来的身世、学识、革命生涯、崇高人格、儒雅风度，和他作为中共领袖之一，为争取抗战胜利后实现和平建国前景而奋斗的作品。在该传记里，陆士清通过曾敏之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它的丰富而深邃的内容，以及它在当时和以后几十年间产生的深远影响，做了全面阐发，让读者充分深刻地看到曾敏之是以怎样的忠诚和才智，实践其“文章报国”的壮志的。全书的风貌，由此可见一斑。



華文
唐連成書

翰

HUA XIN